

# 多样与适配： 民族地区的金融支持与反贫困

□曹廷贵 刘 博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四川 成都 611130)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探索,一系列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与政策已基本形成,加快了少数民族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也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民族自治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大幅跃升,按可比价格计算,民族自治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增长近4倍,年均增长11.5%。但与东、中部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仍存在一定差距。学术界对此是普遍认同的,并在研究中将少数民族地区界定为“贫弱地区”<sup>[1]</sup>、“发展滞后地区”<sup>[2]</sup>、“比较落后区域”<sup>[3]</sup>。然而,这是暗含着假设的,即少数民族地区和东、中部地区差距的客观存在和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一致的发展节奏。但问题就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节奏通常是不一致的,表现为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节奏及发展模式存在差异。

## 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差异性

如果将所处地域不同所导致的民族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定义为外在差异,那民族地区间因为不同少数民族所存在的差异就是内在差异。内在差异往往外化为民族认同感,考察其本质将是一个复杂而繁琐的过程,简而言之是由于语言、宗教、习俗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这种民族属性的差异虽然不会改变地区的发展过程,但会导致发展的结果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民族地区最终通过反贫困过程走上常规发展的途径也会存在差异。换言之,少数民族地区最终所存在的市场经济具体形式不仅将有别于其他地区,而且各民族地区之间也会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融进了部分民族的属性在里面。因此,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相匹配的反贫困策略,就是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发展阶段差异的使然,从而为少数民族地区适应不同的发展阶段提供依据。

正如马克思·韦伯所阐明的,基于新教的理性主义伦理,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繁荣;而新教教派的差别则部分解

释了美国与德国市场的差异问题。中国的少数民族拥有众多的宗教及宗教派别,还有没有形成宗教的各种信仰基础,在反贫困与发展的过程当中,会对发展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影响也将是亦正亦负的。当然,如同资本主义存在于宗教革命之前,新教只是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繁荣一样,中国各少数民族间的差异也只能形成外在的市场经济表现,无法主导形成新的市场经济模式。现阶段用反贫困政策来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阶段相匹配,同时更应关注民族间差异的这种市场经济表现,从而引导并激发各民族中有利于发展的这些影响因素。例如,近几年学界对于“伊斯兰金融”的组织形式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而这一概念则植根于由20世纪的穆斯林复兴运动所产生的当代伊斯兰经济思想(Contemporary Islamic Economic Thought),虽与常态的金融体系相异,但至今已运行于世界各大经济体,为伊斯兰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Karen Hunt - Ahmed 2013)。

## 二、金融支持、反贫困应与经济发展相匹配

“伊斯兰金融”这一概念在国内越发盛行,一方面是迫切希望通过金融创新找到新的反贫困突破口,另一方面则是充分考虑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Honohan(2004)通过对金融与贫困关系进行研究表明,“更深层次的金融体系有利于降低绝对贫困。”<sup>[4]</sup>其研究思路可以借鉴,但是少数民族地区有其特殊条件,不可完全照搬移用。金融支持与反贫困的关系也是拥有类似逻辑的,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关,而经济增长可以有效减缓贫穷。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探讨及研究一直是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研究重点,一方面,站在理性预期的角度,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当有限,甚至是可以忽略的。另一方面,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金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融支持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减贫策略研究”(批准号:12XMZ037)的阶段性成果;本论文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编号:JBK1207017)

且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基本都能达成一个共识,即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需要与相应阶段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适应,以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郑长德(2007)对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民族地区金融中介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可见民族地区的金融组织体系、信用担保体系、金融法律体系以及金融创新体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建立健全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另外,国内也常使用金融扶贫的概念,如曾康霖(2007)认为“扶贫性金融的理论基础是金融具有分配再分配的功能,必须将闲置的货币收入转化为现实的货币收入,进行风险补偿,求得权利与义务的制衡。”<sup>[5]</sup>然而,金融扶贫仅仅针对贫困地区,而金融支持不仅针对贫困地区的扶贫而且针对脱贫地区的后续发展,使用这一概念将涵盖更广。因此,本文基于这样的假设,即金融是经济的货币面,金融体系需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迫切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支持体系,即金融支持政策、反贫困过程应当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 三、反贫困过程中金融支持的多样性与适配性

综上,民族地区的金融支持政策必须是多样的,且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从全球金融反贫困的视角出发,微型金融(Micro Finance)无疑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微型金融是为低收入客户、或者由自雇者组成的集体贷款组织提供的金融服务。广义来说,微型金融是一种社会运动,它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为尽可能多的穷人或不富裕者提供金融服务,集储蓄、保险和汇款于一身。在国外,微型金融象征着是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弱势不一定就是贫困、无抵押者,“在美国微型金融往往和黑人联系在一起”。<sup>[6]</sup>而在中国,要推广的不仅是微型金融满足微小企业贷款的这种形式,而更重要的是推广一种在金融业上关怀弱势的理念。基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乡的一项调研表明,与贷款需求相较,村民更需要的是存钱的便利性,这与通常对贫困地区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单方面的贷款服务并不能解决问题。中国当前推进微型金融的路还很长,就少数民族地区的微型金融而言就更是如此。

作为多样性与适配性的另一方面,结合开发性金融理论,应当将参与式金融开发作为少数民族地区金融支持的又一特色。首先,差异化的金融支持政策有利于抚平少数

民族地区间的差异。例如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北地区可以推进伊斯兰金融形式,而在藏族聚居区可以推进以庙宇形式为主的藏区金融形式,为民族地区提供丰富的金融参与形式。其次,金融支持形式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均是多样与适配的。只有提供与当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支持形式,才能获得当地少数民族群体的积极参与。应当按反贫困过程的不同阶段进行不同的金融支持,对贫困地区支持民生与扶贫,对脱贫地区支持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再次,在少数民族区域内实行的参与式金融开发要广泛吸收各个利益主体参与,通过协调、对话、互动,充分发挥各参与者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制定出符合各利益相关者诉求的方案,使金融支持发挥出最大的减贫、开发功效。

因此,本文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货币面,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会对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支持应与减贫、开发相结合,通过对不同少数民族区域实行针对性与异质化的金融服务政策,充分尊重民族地区的社区传统和习惯信仰,保护少数民族的独特金融文化,强化民族地区非官方参与者主体意识,引导民族地区实行差别化的反贫困战略。

###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课题组. 贫弱地区农村金融制度绩效研究——甘孜州案例分析[J]. 金融研究, 2006, (9): 15-29.
- [2] 郑长德.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7, (1): 54-58.
- [3] 江曼琦, 翟义波. 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对策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5): 36-42.
- [4] Honohan, Patrick, Financial sector policy and the poor: Selected findings and issues,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 43, 2004.
- [5] 曾康霖. 再论扶贫性金融[J]. 金融研究, 2007, (3): 1-9.
- [6] Jean-Pierre Gueyie, Ronny Manos, Jacob Yaron. Micro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sues, Policie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M].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收稿日期: 2013—03—18 责任编辑: 谭晓梅)